

## 馬承源主編《中國青銅器》

上海：古籍出版社

馬孟晶 台灣大學 藝術史研究所研究生

《中國青銅器》是由馬承源主編，陳佩芬、吳鎮烽、熊傳新擔任編撰，上海古籍出版社於一九八八年初次印行。全書共分爲八章，首先論述「青銅器研究的對象和任務」；次依「類別」、「紋飾」、「銘文」介紹目前研究的成果；再就斷代及地域的角度爲青銅器尋求時空中的定位，並討論冶鑄的技術及辨偽的方法。此種自不同角度研究青銅器，及依問題取向出發的編排方式，顯係根據容庚編寫的《商周彝器通考》（以下簡稱《通考》）所樹立的規模而來<sup>(1)</sup>。

容庚在《通考》中整理前代累積的研究成果，並嘗試建立包括銘文、形制、紋飾等多方面研究的體系，對青銅器研究具有開創的意義。但自其於一九四一年出版迄今，又有大批以科學考古的方式發掘出土的新材料；對鑄造技術的分析，也有長足進展。而且海內外學者投入青銅器研究者日衆，在各種意見、觀點交相衝激之下，也孕育出不同於過往的觀點。因此，一本整合舊成績

---

(1)容庚，《商周彝器通考》（台北：東方文化書局，據1941年《燕京學報》專號十七號影印）。

和新問題的通論性著作，實有迫切的需要。最近幾年，有日人林已奈夫出版的《殷周青銅器綜覽》<sup>(2)</sup>，在中文論著方面，則以本文評介的《中國青銅器》最具代表性。

綜覽全書，本書在材料及方法上有二大特色：

第一、運用大批以科學考古方法出土的資料，來取代真偽、年代、地域性均難辨明的傳世器。這當然是因為五〇年代以後，大陸積極從事考古發掘工作，由單一器物、墓葬或窖藏遺址的發掘與研究開始，漸漸找到更多能定位於時空網絡中的「標準器」，追溯彼此的關係，從而不斷填充調整成一個輪廓清晰的體系。

第二、強調冶煉及鑄造技術在青銅器研究中扮演的角色。在《通考》一書中，容庚已對「鑄法」問題提出一些觀察及疑問，但因當時仍未發展出精密的技術，無法深入細述。本書利用科學技術對青銅成分的分析，配合礦坑及冶煉作坊的考古發掘，試圖探明不同時期製作技術及方法上的發展演變，使我們得以進一步了解商周青銅器工藝的高度成就，亦有助於辨偽及斷代。

本書雖承繼了《通考》所立下的基礎，但在取向或觀點方面，卻也有根本上的差異。《通考》上編分成十五章，主要環繞著三類問題<sup>(3)</sup>：第一類是處理青銅器本身的「銘文」、「花紋」、「類別」（形制），並且初步觸及「鑄法」的問題；第二類乃從青銅器學術發展史的角度，討論青銅器的「時代」評述前人作品，

---

(2) 包括《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》、《殷周時代青銅器紋飾の研究》、《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器の研究》，（東京：吉川弘文館，1984，1986，1989年出版）。

(3) 參見陳芳妹，〈商周青銅容器研究的課題與方法〉，「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」論文（1989年8月），未刊稿，頁24～26。

建立起一套「標準器群」，並且檢討收集歷代「著錄」的資料。本書仍保留這些章節（「著錄」部分收入附錄），但在內容及規模上則為深廣。除了考慮時代發展的縱向脈絡之外，也注意到不同地域和民族間的風格差異，因此增列了「華夏族以外地區的青銅器」。

至於第三類問題，是視青銅器為骨董或彝器，從而論及收藏的種種考慮，包括商周彝器的「原起」、歷代的「發現」和「收藏」，在流傳間估算的「價值」、保存時如何「去鏽」、為銘文「拓墨」的方法，官府或市肆商人如何「仿造」、又須如何「辨偽」，以及面臨「銷毀」厄運的情況。由於在容庚著作的時代，科學考古發掘剛剛起步，除少數青銅器可追查到出土地點外，一般青銅器差不多都是公私收藏的傳世器，在古董市場間流通，甚至面臨被盜賣出國的危機，卻仍沒有博物館來收集保存<sup>(4)</sup>。因此容庚的出發點較接近於精通古器物學的古董家。

《中國青銅器》一書的發行，則屬於文化部文物教材的一部分，目的在適應文物博物館幹部培訓教學的需求，除了古器物學的常識之外，十分重視考古學的訓練，這也是因為大規模的科學考古挖掘普及各地，全國各省縣也紛紛成立陳列所或博物館來收藏保管，面對的材料性質及管理的概念既異，「價值」、「收藏」、「銷毀」固不在關心之列，而「去鏽」、「拓墨」這類技術性問題也不再是重點，只有「辨偽」的眼力仍需訓練學習，故加以保存。考古學取向雖非今日青銅器研究之全部，卻可說是大陸當前青銅器研究的主流。而由古器物學轉為考古學取向的背後，

---

(4) 容庚，前引書，頁230。

實隱含二個時代間爲因應面對的材料及研究目的之變易所作的調整。

本書在第一章中即明白指出：「青銅器研究的根本任務，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，闡明商周青銅器自身發生、發展和衰退的歷史。商周青銅器的研究，根本上乃是物質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，乃是爲歷史科學服務的」（第10頁）。在馬列思想一貫重視社會經濟史的影響下，使得本書編者特別注意到目前材料仍甚少見的農具和工具，將之列於「青銅器類別」一章之首。而其篇幅雖遠少於彝器，但顯示和歷來以與儒家體制關係密切，且占青銅器大宗的彝器（包括食器、酒器、盥水器、樂器等，即《通考》一書的主要範圍）爲重心的研究方向有所不同。甚至一向比較少人研究的兵器，本書也相當重視；而「樂器」乙節對音頻、演奏狀況的實驗，「雜器」乙節搜羅相當多的生活用具，都顯示作者興趣之課題與所謂「唯物」的傾向。也因爲如此，在形制、紋飾的分析中，幾乎從不考慮美感觀念轉移的問題；除了對型態組織的變遷作描述分析之外，也關心意涵與功用，這些都是和歷史的解釋密切相關的。青銅器被視爲價值極高的文物，卻並非藝術品的一種。

當我們逐一檢視全書各章的內容，確實可以見到由《通考》至本書的近五十年中，青銅器研究在深度及廣度上的擴展。

一、對於類別，亦即形制變化的討論，基本上延續傳統的以器用爲主、自名或傳統定名的器形爲輔的分類方式，注意其型態來源、出土地域、外形、用處、配合文獻釋名，並根據相關出土文物作斷代及型態的排比，整理出發展的序列。容庚雖已提倡將銘文與形制、花紋作綜合研究，畢竟囿於時代及材料，在形制、花紋兩方面的分析仍無具體發展脈絡可言。本書則先依商——

西周——東周的時代順序，再採用考古學的类型學方法，依局部特徵分類，詳細說明各型式的特徵，並提示流行的時期。

前面已提及本書網羅了前人鮮少觸及的農、工具之研究，足見其研究範圍之擴充；而且除了細分不同的類型發展之外，也詳細考釋其名，例如據《說文》、《方言》定「鉞」之形。在此之前，此類兵器常被誤稱為劍。對於禮器，並注意其出土時放置的方式及組合的規律，配合文獻上的禮制一同討論，以期將之還原至原本所在的歷史時空。對若干傳統誤訂的器名也一一訂正，如習稱為舟的橢杯實應為飲酒器，而非如《周禮·春官》所言之尊彝的器座；而傳統上劃歸卣屬之下的器形，有的改為壺屬，另作討論。

二、書中對紋飾的討論，以中原地區為主。分類上大抵承襲馬承源一九八四年出版的《商周青銅器紋飾》<sup>(5)</sup>之觀點，不再像容庚書中分類的細瑣及散漫。分類簡化成九類：包括由習稱的饕餮紋改成獸面紋、龍紋（其中涵蓋容庚所稱的夔紋）、鳳鳥紋（各種禽鳥均屬之）、動物紋、獸體變形（竊曲紋亦歸入此類）、及由圓渦紋改稱的火紋和幾何紋、人物畫像及其他，代表八〇年代學者對釋名，乃至意涵的新觀點<sup>(6)</sup>。本書雖討論圖案組合的結構、線條之運用、主紋及地紋的配置，也注意紋飾出現的位置或器種，描述相伴出現的紋飾，但對美感或內涵意義的探求則不暇多及。

(5)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組，《商周青銅器紋飾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4年）。其中前半部〈綜述〉部分由馬承源執筆。

(6)陳芳妹，〈《商周青銅器紋飾》評介〉，《藝術學》，第4期（1990年3月），頁299～303。

三、在銘文的部分，由於材料增多，比起容庚的時代，不但解決單字的能力增加，對金文與史事間的連繫也有很大的進展。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知道銘文的格式及內容，造器的目的和功用，在各時代有怎樣的的不同，又反映怎樣的思想觀念。這對青銅器本身的斷代、建立序列，以及古史的重建都有很大的幫助。

四、以商周兩漢時期民族分佈為基礎的地域性討論，肯定了不同民族各自具有本身發展的特色。透過青銅器形制與紋飾上的相互影響，可見到當地文化與中原或鄰近地區文化間的交流關係。日漸豐富而清晰的地域風格之建立，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「都會風格」與「地方風格」之相互影響間的主從或先後的問題。而如春秋時期的吳越、及戰國、秦漢之際的巴蜀文化對西周銅器模仿復古的例子，更在地理區隔的考慮外加上時代先後的因素，此種「追慕文明」的實踐方式，或可對不同文明接觸時所生的效應，提供另一些嶄新的視野。

但書中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問題。

首先，以型態學方法作為型式分類的依據，雖可作得很精細，卻似失之瑣碎。當各部位都被分別考慮時，很難得到對時代進展中風格變化的整體認識。相較起來，林巳奈夫《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》書中將型態配合器體曲線美感需求變化的分析方式，似乎更能抓住變遷的重心，而且亦可探求不同器種之間共同的演化傾向。例如林巳氏指出，在他的分類系統下，西周 I B型的鬲鼎及方鼎同樣有向 II 型過渡的現象，容器部分變淺，足的部分則增長。尤其在同一器群的各種器物之間，常可見到有共通特徵的情況。

其次，在「青銅器銘文」一章中，對銘文書體的分析似與字

體演化相混。偏旁之有無、筆劃之繁簡屬字體演化的範圍，或與書寫時求便利有關；但筆劃肥瘦、結體疏密、行氣寬緊才是書體風格變化，前者雖可能影響後者，二者並無一定的關係，似應分開討論。

本書另一不足之處，在於插圖出現于各章節之後，翻索不易，而且未記錄尺寸資料，使讀者無從臆測其大小比例、型態變化、視覺效果，若能將各圖配於各型式的文字說明之旁，定會清晰有力得多。至如形制變化複雜的兵器，更應附上各部位名稱的分解圖。最好能以圖表方式列出發展序列，對時間上的先後關係、或各型間的同異比較，才易使讀者有一個完整的概念。這是編輯上值得注意的地方。

從容庚的《商周彝器通考》，我們已可看到他意圖超越古董家的興趣，將青銅器的研究變成一門嚴肅而有系統的學科。《中國青銅器》則代表四十多年來的研究成果，採取考古學的取向，結合古史文獻、甲骨金文、科學分析等，織成一張更為細密的網絡，其中的小疵並不掩其創見。儘管陸續發現的青銅器也許會不斷修正書中的說法，但作為現階段的研究成果，仍不失為勾勒青銅器學基本風貌的力作，也可能提供刺激，成為讀者思考的起點。

。